

社会学视阈下西文版《红楼梦》翻译与出版研究

周思蕊¹ 王颖冲²

(1.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和高级翻译学院, 北京 100083;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西文版《红楼梦》面向数亿西语国家读者,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但相关翻译研究明显不足。本文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为依托,创新性地提出社会翻译学的“双环”分析模式;并以赵振江西文版《红楼梦》全译本为例,揭示汉学、出版和文学三大场域互动对该译本翻译及出版的影响,以及外部场域与译者之间的主客互动和双向作用力。研究表明,场域间关系并非总以斗争为主,新场域往往是在向临近场域借鉴并与之合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惯习与场域不相契合时,译者并非只能妥协:有经验的译者可能凭借其文化资本修改场域规范,成为建构新场域的主导者。研究可为中华文化外译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呼吁建立专家主导、多方参与、聚力共赢的翻译出版格局。

关键词:场域;惯习;西文版《红楼梦》;社会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4-0147-14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习近平,2023)《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角色举足轻重。1988 年,由赵振江主译的西班牙语版《红楼梦》(*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首卷本正式发行,成为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首版发行量即创出版社销量纪录(赵振江,2010:65),引发当地媒体广泛关注。西班牙主流媒体《国家报》曾刊文称:“《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正如《堂吉珂德》之于西方文学。而今,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终于翻译成了西班牙语。”(Guelbenzu,2010)

然而,相比于《红楼梦》英译研究,西语译本相关研究明显匮乏,这与西班牙语作为世界第二大语种的地位不相匹配。现存相关文章多是由译者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式文献,研究

收稿日期:2024-03-25

基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北京:城与人》(23WZWB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思蕊,女,北京语言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翻译理论研究。

王颖冲,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周思蕊,王颖冲.社会学视阈下西文版《红楼梦》翻译与出版研究[J].外国语文,2025(4):147-160.

类成果则集中于对文本策略和修辞技巧的微观研究(Zhou, 2021:26-31),缺乏联系翻译环境对译本生产及出版过程的宏观考察,运用社会翻译学理论探讨红楼西译的研究尚属阙如。因此,本文将联系翻译活动发生的真实场域以及译者惯习同场域之间的互动,探讨赵振江西文版《红楼梦》的译介过程及其成功打入译入语文化之原因,以期丰富社会翻译学领域的多语种研究视角,为中国典籍走向西班牙语和拉美世界提供路径参考。

1 社会翻译学的主要概念及“双环”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学界借鉴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理论模式,促使翻译研究向“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Merkle, 2008:175)。布迪厄将场域比作物理场,是“关系的系统”(Bourdieu et al., 1992:106),社会客观结构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人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即场域与惯习相互建构。布迪厄关于场域与惯习的描述反映出翻译过程之中主客互融:翻译活动过程通常发生于多重场域交织的网络之中,场域之间彼此影响渗透,而身处其中的译者在受到场域合力的同时也对其规范进行主观筛选和内化,参与完成场域建构。因此,场域与惯习是翻译活动的“客”“主”两面,共同决定了译介形态。

从“客”的方面来说,翻译的“跨(trans-)”领域特性决定了其生产过程总是伴随着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Heilbron, 1999:431; Sela-Sheffy, 2005:8),相比于文学、商业等场域,翻译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独立的领域,即布迪厄(Bourdieu, 1984/1993a:182)所说的“折射率(refraction coefficient)”较低的领域。因此翻译活动往往是多场域共同协调的结果,翻译实践需置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大系统中用大历史、大格局的视野加以研究(胡牧, 2023:22),而翻译研究对于社会的关注也是翻译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傅敬民等, 2023:8)。关注外部大环境的同时,翻译研究更离不开对直接行为人的考察,因为能动的人是翻译产品生成、翻译过程实施以及最终翻译功能实现的关键所在(邢杰, 2023:10),而翻译活动的规范恰可能受到兼具多重身份的译者在其他场域中建立的惯习影响所形成(王悦晨, 2011:12)。这一假设将目光引入对翻译“主体”,即对译者惯习的讨论。

自1998年西米奥尼(Simeoni, 1998:1)基于布迪厄“惯习”理论提出“译者惯习(translator's habitus)”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惯习理论进行了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下的实证研究,学界对此已非常熟悉,故不做赘述。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社会化的个体,译者惯习并非只和翻译场域相联系,而应考虑其在译者“多重身份”(Meylaerts, 2008:94)影响下形成的多元属性。除此之外,惯习还具备发展的特性,和场域规范一样随时空发生变化。因此,惯习与场域规范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或不契合(Inghilleri, 2005:71-72),而契合程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译者内化外部场域规范的程度。

社会翻译学研究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全面考察的有效途径(王洪涛,2021:39),但在方法论建构方面仍有不足(王洪涛等,2023:14)。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研究三环节,分别是“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勾画出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客观关系结构”和“分析参与者惯习”(Bourdieu et al., 1992:104-105),投射到翻译学研究方法中,分别对应三方面内容:(1)翻译与相关场域互动分析;(2)译者与各场域互动分析;(3)译者惯习分析。基于此,本文联系中国典籍外译实践,创新性地提出在译语语境中社会翻译学的“双环”分析框架(见图1),以期丰富社会翻译学研究方法论的本土化应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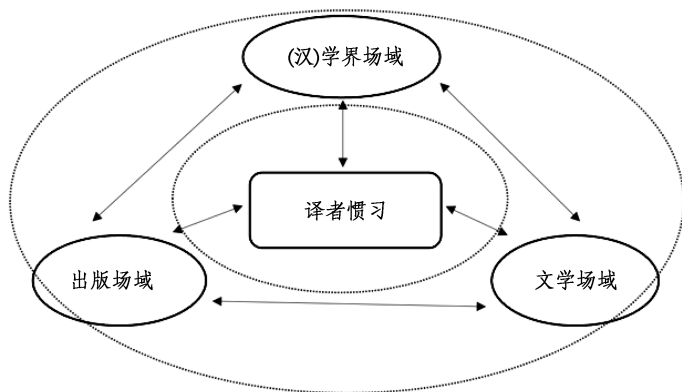


图1 场域间互动和场域—译者间互动的“双环”分析框架

“双环”框架揭示出内外两环中的场域和译者惯习要素在翻译出版中的双向作用力：外环旨在探讨参与翻译的不同场域之间如何互动,并合力作用于翻译活动中心的译者;内环聚焦译者惯习与场域之间的互动,即译者如何在结合自身惯习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内化外部场域规范,最终落实为文本风格和策略。下面以西文版《红楼梦》为例,运用“双环”分析框架对其译介出版进行剖析,以期内外贯通地挖掘出小说成功走入西语世界的真实动因。

2 西文版《红楼梦》译介的外环:多重场域间互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对中国文学译介尚处起步阶段,主要以诗歌、传说故事和哲学体裁为主(宓田,2022:127),而《红楼梦》的译介开创了中国四大经典小说西文直译之先河。赵振江版《红楼梦》翻译始于1987年,西班牙格拉达纳大学(以下简称“格大”)出版社同中国外文局签订出版协议,由中方提供西文底本,外方负责审阅出版。然而,由于该底本未达到外方出版要求,经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文化参赞张治亚引荐,格大委任赵振江主持译文校正工作,《红楼梦》西译由此拉开序幕。首卷本于1988年由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受到各界媒体和文学杂志广泛报道。首版发行的2500册于一个月之内售罄,创出版社销量纪录,打破了中国典籍西译初期译而不通、通而不受(朱振武,2019:151)的局

面,西文版《红楼梦》自此走进西班牙,成为中国文学成功在西译介之典范。

从西文版《红楼梦》的发起和出版过程中不难看出,该译本形成于多重场域交织的动态网络之中,翻译活动受到场域间和场域—译者间互动的“双环”效应影响。下面,我们将首先从外环场域间互动入手,深入考察翻译产生和传播的外部环境。西文版《红楼梦》翻译主要受到(汉)学界、出版和文学三个场域影响,彼此两两互联,在协商中形成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祝圣(consecration)”(Bourdieu, 1996: 167)。

首先,从出版和学界的场域关系来看,格大出版社服务于学界发展需求,生产过程由学界专家主导;学界则以其文化和象征资本帮助出版社在当地得到“祝圣”。《红楼梦》西译工作应西班牙汉学场域发展需求而发起,而当地汉学的起步则同中西两国政治交往密切相关。197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Rey Juan Carlos I)首次访华,同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双方政治场域交流呈现空前繁荣态势,推动西班牙当代汉学起步。一时间,包括格大在内的西班牙高校纷纷开设中文课程,将汉语教学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之中。随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西班牙留学生访华项目开启^①,当地对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响应学校汉学发展需求,格大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局签订合作协议,《红楼梦》西译工作于1987年正式启动。作为高校附属机构,格大出版社旨在服务高校教研活动^②,出版委员会通常由德高望重的教授出任,给予学界专家高度尊重和充分自由,形成了“专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例如,西文版《红楼梦》出版期间,该社由历史系教授曼努埃尔·巴里奥斯(Manuel Barrios)执领,曾专门成立《红楼梦》出版委员会,组建学界专业人士参与评审,为出版质量严格把关(赵振江:1990)。在这种“专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中,出版社借助专家的文化和象征资本在当地文学和出版领域获得祝圣,而出版社本身的祝圣则为《红楼梦》在当地传播提供条件。根据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艺术商本身得到祝圣的程度越高,其对艺术作品的祝圣效果就越好(Bourdieu, 1996: 167)。由此可见,学界同出版社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红楼梦》在西成功译介创造重要前提。

第二,从学界与文学界的场域关系来看,文学场域为汉学界遴选原作和制定译策提供价值期待和参考范式;汉学界对异域文学的译介则为当地文学发展注入多元视角。中国典籍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受到国际文学场域结构和译入语文学系统运作规律的制约(Heilbron et al., 2007),因此汉学场域在遴选原作时需同时考量两国文学场域需求:一方面宜优先选择在源语文学场域中已被“祝圣”的经典作品,另一方面则需考虑符合译入语文学兴趣和

① 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西班牙留学生访华项目正式开启,培养了包括雷林科(Alicia Relinque Eleta)、胡安(Juan José Ciruela)、加西亚-诺布雷加斯(Gabriel García-Noblejas)等在内的一大批现代汉学、中国学领域专家,目前已成长为西班牙各大高校中文教研的骨干力量(参见周思蕊,2022)。

② 资料来源于格大出版社官网首页(https://editorial.ugr.es/p/2272_presentacion_110/):“格大出版社旨在为格拉纳达大学社区提供支持服务……主要目的是传播科研、支持教学及科普活动。”

期望的作品(王洪涛,2021)。*《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嘉庆年间人得輿曾于*《京都竹枝词》*中言:“开篇不读*《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足见其在源语文学中之祝圣程度。而译入语文学场域对*《红楼梦》*的兴趣则主要出于两点原因:第一,*《红楼梦》*中梦境、镜子、双重主体与时空环复等元素勾画出一个“假亦真时真亦假”之迷离境地,迎合西语文学界对东方之怪诞神秘想象,这一点从在拉美作家博尔赫斯20世纪40年代对“宝玉之梦”和“风月宝鉴”^①两处选译片段中即可窥见。第二,*《红楼梦》*荒诞图式下蕴含的哲思化阐释与西语文学中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相似,更增强其对译入语文学界的吸引力。从虚实交融的叙事方法、象征寓意的修辞风格到万艳同悲的结局铺设,译入语读者似乎在*《红楼梦》*中找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东方异域中之共鸣。由此可见,正是源语和译入语文学界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共有认同使*《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外译初期的理想译介目标。然而,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文坛而言,中国翻译文学仍处“边缘”地位,如果罔顾译入语读者对中国文学认知的现实情况,容易导致红楼梦西译本沦为“限制性生产活动(restricted production)”(Bourdieu,1984/1993a:15),阻碍其在大众读者中的广泛传播。

“限制性生产活动(restricted production)”是布迪厄相对于“大规模生产活动(large-scale production)”提出的文化社会学概念,指生产不以大众市场为目标,带有纯粹艺术生产特点,其成功以同行专家认可(peer recognition)为衡量,显示出重象征资本而轻经济资本的导向(Bourdieu,1984/1993a:15-16)。在翻译传播领域,限制性生产活动靠近图里翻译规范中的源语文化和充分性(adequacy)一端,通常对语言形式或文化特点采取不加文饰或补偿的异化译策,容易违背主流商业翻译规范而限制其适销性。反之,“大规模生产活动(large-scale production)”则靠近译入语文化和接受度(acceptability)一端,通过对跨语言、跨文化难点进行适当调整,使译本更易在大众间引发广泛理解和共鸣,推动译本进入大规模生产。考虑到西文版*《红楼梦》*的译介对象是对中国文化并不熟悉的西班牙普通读者,赵振江在翻译任务开始之前即确立起“自然、流畅”的整体风格(赵振江,1990:325),从而有效避免*《红楼梦》*在中国文学译介初期成为限制性生产活动。而获得大众认可的*《红楼梦》*也对当地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凭借其多维复调的叙事特点、前后照应的逻辑架构和辩证对立的修辞哲学为西班牙文学场域注入新活力,引发关于中西诗学象征、爱情观、女性叙事及权力关系的讨论(Gruia,2001;Priego Casanova,2012;Martín,2018;San Ginés,2018)。*《红楼梦》*

①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基于王际真英译本和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德译本,选取第五十六回“宝玉之梦(El sueño infinito de Pao Yu)”和第十二回“风月宝鉴(El espejo de viento y luna)”两个片段进行改写式翻译,编入*《幻想文学作品选》*(Antología de la Literatura Fantástica,1940)。此为*《红楼梦》*在西语世界的第一次译介,但非全译本,仅为片段节译。

的作品影响力甚至由文学界扩展至文学爱好者群体,包括阿莱夫(El Aleph)、推特(现X)等在内的西班牙主流文学论坛及社交媒体纷纷成立红楼梦讨论小组^①,为中西文学场域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

第三,从文学界与出版界的场域关系来看,文学场域规范为出版质量提供标尺;出版社则凭借行业经验为文学作品打开销量市场。格大出版社深知语言的规范性和文学性是保证译本在当地畅销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接到外文局提供的翻译底本时,出版社拒绝发行的主要原因就是“西班牙语水平未达到出版要求”(赵振江,2021:1)。为此出版社特邀专家对照原文进行校正,优化语言表达,去除底本的南美风格^②,最终成功对接译入语文学规范。而在传播环节,优秀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有力的产品包装和宣介。为使西文版《红楼梦》达到理想销售效果,出版社基于对读者审美情趣、阅读品位和接受习惯的了解,制定了一系列营销策略,例如1988年首版封面采用极具异域风格的中国女性图像汉字纹路做底,宣传时多次强调该书是“第一个从中文直译的译本”^③以增强其市场吸引力。同时,出版方积极联手主流文学杂志和媒体、书评家进行市场拓展活动,如西班牙广受欢迎的《读书》(Leer)和《吉梅拉》(Quimera)等杂志,《先锋报》(La Vanguardia)、《ABC报》(ABC)、《国家报》(El País)等主流报刊均先后发表相关评介和推荐文章(赵振江,1990),其中两大重要报刊《ABC报》和《国家报》更是在标题中盛赞其为“中国最好的小说”(Alberto de Cuenca, 2010)和“格拉纳达大学翻译的最伟大的中文小说”(García, 1987),将《红楼梦》在西传播推向高潮。

从《红楼梦》西译的外环场域互动来看,学界、出版和文学场域均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原作遴选、译策制定和出版传播的过程中,在彼此协商中就译作风格达成一致,进而共同作用于翻译活动的行为人。下面我们聚焦惯习与场域互动的内环,即从译者角度出发透视其同三个场域的互动过程。

3 西文版《红楼梦》译介的内环:译者一场域间互动

尽管(汉)学界、出版和文学构建起翻译活动的外围场域规范,译者仍然是文本形态的执行者,而只有被译者“内化”的场域规范才能最终体现在译文之中。译者对场域的内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惯习同场域规范的“契合程度”(Inghilleri, 2005:71)。在西文版《红楼梦》翻译中,译者赵振江的多重身份塑造起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多元译者惯习,主要

① 阿莱夫(El Aleph)论坛相关内容参见 El Aleph: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http://foro.elaleph.com/viewtopic.php?t=26343>);推特(现X)相关内容参见 El reto del pabellón rojo(<https://twitter.com/hongloumeng2020>)

② 外文局提供的底本由捷克-秘鲁籍译者米尔克·拉乌埃尔(Mirko Lauer)翻译,语言的南美风格明显,包括指小词的大量使用(例如 queridito, periquito)及用词差别(例如使用 luego de 而非 después de)等。

③ 赵振江曾在1990年发表的《西文版红楼梦问世的前前后后》中做出澄清,格大关于“直译”的说法并不准确,有出于宣传效果的考量。

包括专家学者型惯习、重视译文审美性的诗人型惯习和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译者惯习。这些惯习在同汉学、出版和文学场域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各有侧重地作用于西文版红楼梦翻译目标确立、译策制定和译本推广三个层面(见图2):

- (1) 中国文化传播者惯习与汉学场域互动——确立翻译目标,力求信达兼备;
- (2) 专家学者型惯习与出版场域互动——立足专家视角,重建翻译规范;
- (3) 诗人型惯习与文学场域互动——融通中外审美,推动译本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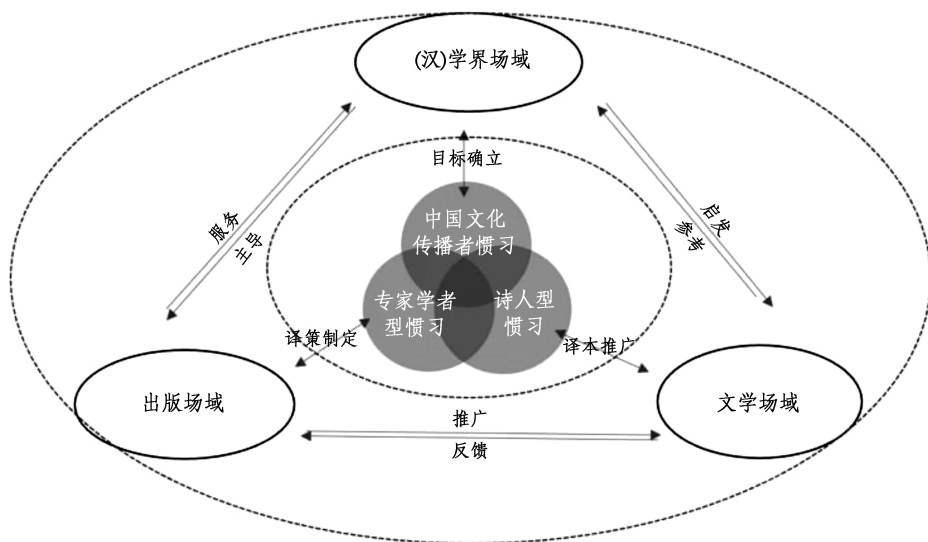


图2 译者惯习同场域间互动

3.1 中国文化传播者惯习与汉学场域互动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西班牙语翻译人才,赵振江在翻译实践中始终心系祖国和中华文化,他曾坦言:“作为西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我既没有版权也没有稿费……弘扬中华文明,促进文化交流,就是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实事。”(赵振江,2021:2)这一文化传播意识在文本层面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忠实保留和阐释。而考虑到西班牙当代汉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当地读者对中国文学还很陌生,如何在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兼顾读者接受,是汉学场域对译者提出的新挑战。在这一阶段,译者惯习对场域规范进行了积极“内化”,双方就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翻译风格达成一致意见。

综合译者和西班牙汉学界对《红楼梦》译介的诉求^①,双方一致认为作为第一个西语全译本,其目标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目标群体是西班牙普通读者,因此总体风格应自然流畅,力求信达兼备。事实证明,在此阶段的译者惯习—场域互动中,译者充分内化了汉学场域规范,尤其体现在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处理上。

^① 格大西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佩德罗·桑吉内斯(Pedro San Ginés)对《红楼梦》西译曾做出中肯评论:“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曾起过积极作用,而率先到达中国的传教士恰恰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遗憾的是到了现当代,我们远远地落后了。现在我们要急起直追。《红楼梦》的出版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参见赵振江,1990:324)。

通过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古诗中总计 321 个中国生态文化符号翻译的统计(见图 3)发现,70.10%的专有文化意象得到忠实保留,其中增译(31.47%,包含文内和文外增译)和直译(29.91%)是实现意象保留的主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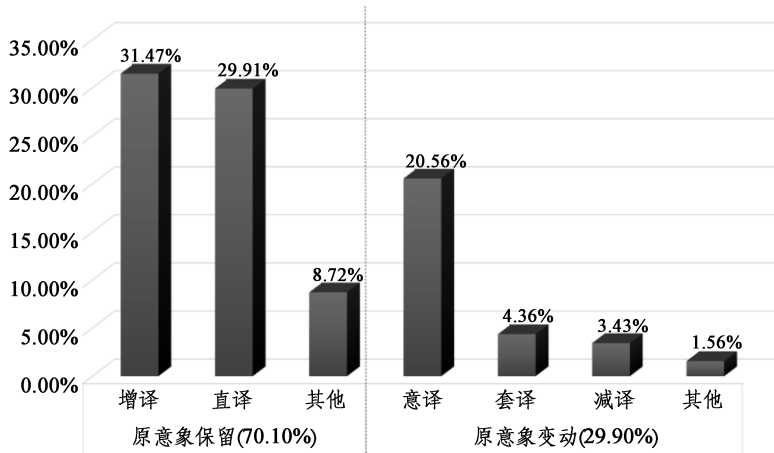


图 3 文化意象变动与保留率及各译策占比

增译(31.47%)包含“文内增译”(9.29%)和“文外增译”(22.18%)。其中“文外增译”(尾注)是赵译本处理文化意象时最常使用的翻译技巧,尤其见于对情节发展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述处理上。注释的使用为译入语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一本微型百科全书,对中国文化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王树槐,2023:24)。例如,在处理《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的人名隐喻时(见例 1),译者对原文意象均采用“文内直译+尾注释义”的方式进行翻译,忠实保留了中文善用谐音双关和含蓄叙事的风格特点。而中国外文局出版的米尔克·拉乌埃尔(Mirko Láuer)译本则忽略人名隐喻内涵,此为两译本最重要的区别之一(Zhou,2021:420)。

例(1)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Aquel cinturón de jade queda colgado en el bosque, y sepultada en la nieve aquella horquilla dorada *.

尾注*: Las imágenes compuestas por dos árboles y un cinturón de jade hacen referencia a Lin Daiyu. El carácter Lin representa el Bosque con dos árboles. Por otra parte su nombre generacional está formado por un primer carácter Dai, que significa 《Cinturón》 y un segundo, Yu, 《Jade》. La 《horquilla dorada en la nieve》 alude a Xue Baochai, 《Horquilla Preciosa》. (两木一带的图画形象指林黛玉。汉字“林”以两“木”构成,“黛”通“带”,“玉”为“玉”。“金簪雪里埋”喻指薛宝钗,名字意思为“美丽的头钗”)

对于跨文化差异明显的词项(29.90%),译者并未单纯删减,而是通过意译(20.56%)、套译(4.36%)等补偿性技巧,帮助中国文化在译入语环境中实现“适应性重生”。例如,在翻译第六章《朝叩富儿门》中“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中的“骨肉”隐喻时,译者通过借用

西语中“de la misma sangre(同一血缘)”保留了“身体组织→亲密关系”的原文映射,巧妙重现了“骨肉”意象的中文内涵。再如,在处理“天子”“天兵”等词汇时,译者充分考虑到中西君权神授中“天人合一”和“神人分离”的区别,采取意译将“天子”处理为“emperador(皇帝)”,“天兵”意译为“tropas imperiales(皇家军队)”,避免直译可能引发的混淆(如“天子”直译为“Hijo del Cielo”容易误读为“耶稣”)。这些表述看似微小,却反映出译者为中国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精准传播做出的努力,是每位译者应该谨慎斟酌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在处理中国文化元素时,译者在求信的基础上通过加注、意译和套译等方法保证译文的流畅自然。这种“信达兼备”的翻译风格构架起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桥梁,也成为推动西文版《红楼梦》在西班牙当代汉学起步阶段传播的重要因素。

3.2 专家学者型惯习与出版场域互动

随翻译工作正式启动,外界规范的权力棒移交至出版场域。上世纪80年代,西班牙出版界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汉学家资源匮乏,汉西翻译出版场域尚处发展初期(周思蕊,2024:47)。因此,在这一环节的互动中,译者凭借其作为专家学者的文化资本、对《红楼梦》原文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中西两种语言文化的驾驭,违抗并调整出版方提出的不合理规范,成为构建汉西翻译场域规范的“主导者”。这种专家主导意识主要体现在构建翻译模式、制定任务进度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

第一,主动制定“中西合作”翻译模式。出版社起初委任赵振江单独为《红楼梦》西语版定稿。为还原译文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性,译者坚持要求“一位西班牙语水平很高的合作者”(赵振江,1990:324)。这一提案最终获得出版方支持,委任青年诗人加西亚·桑切斯(García Sánchez)辅助,而这一“中西合作”的翻译模式也为推动该译本在译入语读者间的广泛传播创造条件。

第二,协商修改翻译进度。出版社起初制定的任务是对外文局底稿进行“校阅”,因此给定的期限为三个月内完成第一卷。但赵在拿到底稿后发现与原作出入很大,由此向出版社提出延长交稿期限的要求,导致原本的校阅工作几乎变成重译(赵振江,2010:63)。这一要求不仅出于译者对中国典籍外译事业的责任感,也是译者对原作强烈的个人情感使然。赵振江曾坦言,在中国的四大名著里,自己对《红楼梦》一直情有独钟(赵振江,2010:62)。在个人喜好和传播中国文化愿望的双重激励下,译者对翻译任务展现出极强的内驱力,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早已超越了受人雇佣的“翻译匠”,而成为翻译实践的“主导者”。

第三,“专家视角”主导翻译策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作品在西班牙仍处于边缘位置,汉西主流翻译规范倡导对异质文化采取归化处理方式。赵振江深知,作为第一个面向大众读者的西语全译本,风格应尽量自然流畅,体现出其对主流翻译规范之认同。但在重视译本接受度的基础上,他也力求充分还原源语文化信息:“(原文中)有许多对中国读

者无需注释的地方,对外国读者就非加注不可。”(赵振江,2010:63 出于学者型惯习的驱使,他提出重新校订文中注释、对文化元素增加尾注的策略(赵振江,2010:63)。这种“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策略在译入语环境中极受欢迎,成为弥合西班牙读者对中国文化认知缺失的重要手段(Ku,2006:13)。实际在此之前,文外加注的积极作用也已在中国作品的英译传播中得到证实,例如英国民俗学会会刊《民间故事》(The Folk-Lore Record)曾对翟理斯译文做出类似评价:“不但正文可以提供帮助,译者的脚注也有着永恒的价值。”(王树槐,2023:29)除丰厚翻译策略之外,赵振江还针对其合作者加西亚·桑切斯不通中文的情况,探索出一套针对诗歌翻译的“直译+意译”双重参照模式^①,为当时中西合作翻译中高水平汉学家的短缺问题提供了权宜之计。

3.3 诗人型惯习同文学场域的互动

除了译者和学者,赵振江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诗人。他的诗人惯习尤其体现在原作遴选中对诗歌体裁的偏爱,诸如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等著名诗人正是通过赵振江的译笔被中国读者所熟识。他在诗歌翻译领域的成就不仅为其带来了翻译《红楼梦》的机会^②,也促使其形成“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观和重视译入语文学审美的译者惯习。赵振江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孪生行为,是一种“二度创作”,重现原诗精神有时需要对原诗形式做出取舍(午荷,2022)。这一惯习顺应了西班牙文学场域规范,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学规范的同时自然融入中国元素,从而推动了西文版《红楼梦》在当地的传播。

在诗人型惯习的作用下,译者跳出原文形式窠臼,甚至采取创造性叛逆的方法达到同原文的神似。例如,在处理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中“柳丝榆荚自芳菲”时,译者通过增强拟人和对比修辞,将其译作“Los sauces, moviendo los cabellos, y los olmos, mostrando sus monedas(柳树甩动长发,榆树尽展榆钱之芳华)”,有效增加了诗歌语言的形式弹性和视觉冲击力,在译入语诗学空间中实现原文意蕴情感的“转世”存活(张保红等,2022:111)。在处理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时,译者考虑到中文擅用叠词和西文忌讳重复的差异,译作“sola, tímida, silenciosa, ¿a quién dirige sus lamentos?(孤单,羞涩,沉默,伤感更与谁诉说?)”通过连用三个形容词“sola, tímida, silenciosa”替换“默默”,既实现了对原文的语义和音律补偿,又使译文更符合西班牙语诗学和韵律特点,将一位敏感多思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此外,为确保译文符合当地文学审美,译者还充分调动译入语文坛资源,广泛听取西班牙

① 赵振江为弥补其合作者不通中文的问题而做两种翻译:其一为逐字硬译,保留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特征;其二为通顺意译,还原中国古典诗歌内涵意蕴。西籍译者加利西亚·桑切斯依照两种译本拟就西文译本,使其符合西文诗歌韵律(参见赵振江,2010:64)。

② 时任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文化参赞张治亚通过赵译《马丁·菲耶罗》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出得知赵振江,并将其推荐给科大进行西文版《红楼梦》审校工作。

牙诗人朋友的建议,诗歌译文通常要交给几位当地诗人朋友传阅并听取意见修改。随后,这些参与《红楼梦》审阅的西班牙文人也携带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介入译作传播,以其“名人效应”为《红楼梦》传播提供有力背书。例如,西文版《红楼梦》问世后,西班牙作家何塞·迪托(José Tito)率先在格大校刊上发表短评《红楼梦:雄心勃勃的出版业绩》,当地文学杂志《比特索克》《波斯达塔》等也纷纷转载小说章节,一时间《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名词。格大出版社则依托文学和学界资源,通过举办专场发布会、《红楼梦》人物画展等方式扩大该书在学界的影响力,甚至将其作为课程教材推广使用(赵振江,2021)。在西班牙亚马逊网站上,西文版《红楼梦》读者评分达4.5,评论区不乏溢美之词:“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人物场景描写翔实,仿佛身临其境”。由此可见,《红楼梦》的西译过程充分调动有关行为者和机构,合力营造中国文学翻译传播的“外力条件”(汪宝荣等,2019:129),并依赖具有国际声誉的译者、出版商、媒体、评论者和专家学者介入生产、营销和流通各个环节,开辟了当地“文人参与、文人反馈、名人推介”的典籍外译模式,构筑起强强联合的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在译入语文学场域内的有效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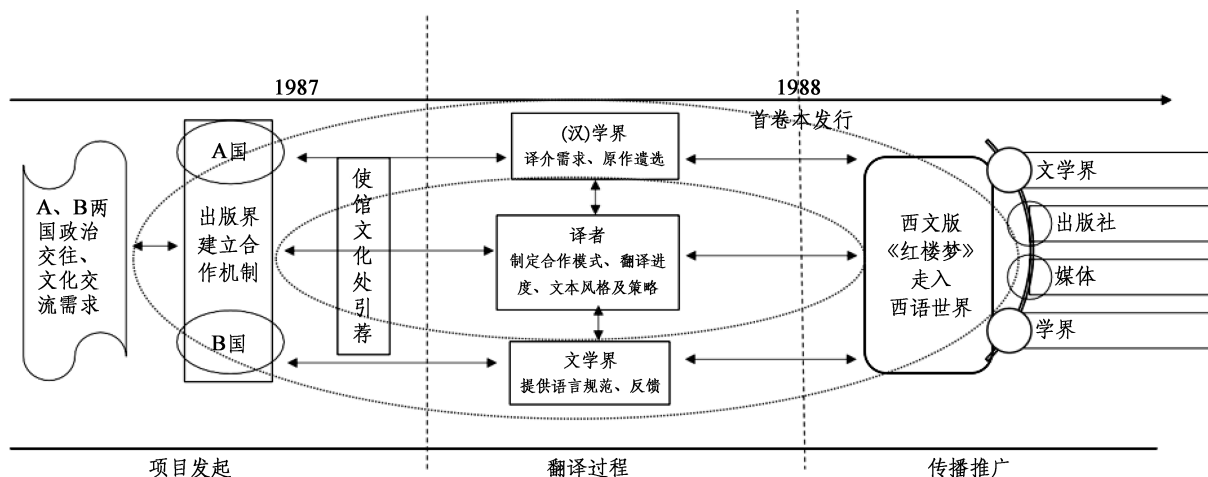


图4 《红楼梦》在西翻译出版流程图

纵观《红楼梦》在西译介的整个过程(见图4),不同场域间互动、译者—场域间互动贯穿项目发起、翻译过程和传播推广整个流程,形成彼此交叠、互联共通的内外两环,共同作用于位于中心位置的译者。由此可见,《红楼梦》在当地的成功译介是多方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晶。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有两点优势:第一,多方基于行业经验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动态协商和构建翻译话语,更有利于生产出适应文化交流、出版和传播各阶段需求的翻译产品;第二,多方参与能够有效增强各方对译作传播的责任感和参与感,更愿意参与到后期推介的过程中来,合力推动《红楼梦》西译在当地的传播。良好的传播效果反之则有助于深化各方合作,从而形成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

4 结语

本文关注布迪厄社会学“场域”与“惯习”概念在西文版《红楼梦》翻译活动中的解释力,并对布迪厄社会学研究方法做出本土化理论创新,提出中国典籍外译研究的“双环”路径:外环聚焦外部场域之间互动,内环剖析译者惯习同场域之间互动,从而全面立体地重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的典型场景。

在场域间互动的环节中发现,与布迪厄(Bourdieu, 1993b: 73)关于场域充满“斗争(struggle)”的描述有所不同,参与西文版《红楼梦》翻译的(汉)学界、出版和文学三个场域在协商过程中相互借鉴、互为支持,共同构建起汉西翻译场域起步阶段规范。这种合作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第一,新场域的建立往往是在同临近场域的学习合作中发展起来,通过借鉴其他场域经验达到规避风险、扩大共同利益的目的;第二,参与翻译的场域和行为人具有相似的价值认同,在西文版《红楼梦》翻译中主要体现为“专家主导”的生产模式,出版方尊重译者的专家地位,给予其充分信任和话语权以构建翻译场域新规范。

在译者一场域间互动环节中发现,当译者惯习同场域相契合时,译者基本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场域的价值观念。然而当译者惯习同场域规范不相契合时,这种“不和谐(discordance)”并非总是引发译者方面的调整,被动内化社会秩序中业已建立的游戏规则(Inghilleri, 2005: 71),译者也有可能推翻既定规则,成为重建场域规范的“主导者”。这一点在新场域建立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研究建议,中国典籍外译在开辟新语种市场时应尽量选择具备较高象征和文化资本的译者,充分借力出版、学界和文学界三大场域,合力构建专家主导、多方参与、聚力共赢的翻译出版格局。

参考文献:

- Alberto de Cuenca, L. 2010. La Mejor Novela de China[N]. *ABC Cultural*, 2010-12-31.
-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84/1993a.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3b. *Sociology in Question* [M]. Richard Nice. London: 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Bourdieu, P.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cía, A. V. 1987.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Traduce una de las Grandes Novelas de la Literatura China. [N/OL]. *El País*, 1987-11-10[2023-10-05]. https://elpais.com/diario/1987/11/10/cultura/563497208_850215.html
- Gruia, I. 2001. Mujer, poesía e ideología amorosa en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G]//M. A. Vázquez-Medel & M. Arriaga Flórez (eds.) *Mujer, cultura y comunicación: realidades e imaginarios. IX Simposi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Andaluza de Semiótica*. Sevil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459-468
- Guelbenzu, J. M. 2010. El 'Quijote' chino[N/OL]. *El País*, 2010-11-06[2023-10-05]. https://elpais.com/diario/2010/11/06/babelia/1289005937_850215.html

- Heilbron, J. 1999.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 429-444.
- Heilbron, J., Sapiro G. 2007. Outline for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G]//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93-107.
- Inghilleri, M. 2005. Mediating Zones of Uncertainty: Interpreter agency, the Interpreting Habitus and Political Asylum Adjudication[J]. *The Translator*(1): 69-85.
- Ku, M. 2006. *La Traducción de los elementos lingüísticos culturales (chino-español) estudio de Sueño en las estancias rojas* [D]. Barcelona: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https://ddd.uab.cat/pub/tesis/2006/tdx-0809106-123747/mk1de2.pdf>
- Martín, T. 2018. Imagen de la mujer en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La construcción y la transgresión del género[J]. *Quaderns de Filologia-Estudis Literaris* (23): 39-62.
- Merkle, D. 2008.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G]//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5-186.
- Meylaerts, R. 2008.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G]//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1-102.
- Priego Casanova, L. 2012. *El amor en la literatura china: Una aproximación al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de Cao Xueqin* [D]. Barcelona: 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
- San Ginés, P. 2018. Lenguaje figurado en la novela china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G]//A. Magdalena & I. Balsas (eds.). *Lenguaje figurado y competencia interlingüística (II): Aplicaciones lexicográficas y traductológicas*.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133
- Sela-Sheffy, R. 2005.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J]. *Target*(1): 1-26.
- Simeoni, D. 1998.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1): 1-39.
- Zhou, S. 2021. *Comparative translatio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ulturemes in Hong Lou Meng: A multilingu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D]. Barcelona: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 傅敬民, 李亚峰. 2023. 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借鉴与创新[J]. *外语教学*(5): 7-13.
- 胡牧. 2023. 社会翻译学的价值功用与应用前景[J]. *外语教学*(5): 20-25.
- 宓田. 2022. “他者”的困境与“自我”的突围——形象学视域下《西游记》女妖形象的西译研究[J]. *外国语文*(6): 122-128.
- 汪宝荣, 李伟荣. 2019. 同一译介传播模式下的译作传播影响力差异社会学分析——以《红高粱家族》《酒国》为例[J]. *外国语文*(5): 124-129.
- 王洪涛. 2021.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理论思考——社会翻译学的观察、主张与方略[J]. *中国翻译*(6): 38-45+191.
- 王洪涛, 柳娟. 2023. 社会翻译学方法论——基于本体论、认识论与学科性质的体系建构[J]. *外语教学*(5): 14-19.
- 王树槐. 2023.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的古代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J]. *外国语文*(4): 23-31.
- 王悦晨. 2011.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 *中国翻译*(1): 5-13.

- 午荷. 2022. 汉语语境中的西语诗歌翻译实践——对话西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3-29[2022-08-30]. <https://www.zgshige.com/c/2022-03-29/20969391.shtml>
- 习近平. 2023.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OL]. 求是(17). 2023-08-31. [2023-10-0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
- 邢杰. 2023. 新范式何以成为可能? ——社会翻译学学理基础探究[J]. 上海翻译(5):6-11.
- 张保红, 朱芳. 2022. 画译:20世纪美国诗人汉诗英译新视角. 外国语文(6):102-112.
- 赵振江. 1990. 西文版《红楼梦》问世的前前后后[J]. 红楼梦学刊(3):323-328.
- 赵振江. 2010. 《红楼梦》西班牙语翻译二三事[J]. 华西语文学刊(2):62-65+410.
- 赵振江. 2021. 《红楼梦》走进西班牙语世界[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0-14(6).
- 周思蕊. 2022. 做中国文化的“摆渡人”(海客话中国)[N/OL]. 人民日报海外版(7), 2022-07-29[2022-08-3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2-07/29/content_25931528.htm.
- 周思蕊. 2024.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的古籍翻译与汉学研究[J]. 国际汉学(3):46-57+156.
- 朱振武. 2019.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J]. 广东社会科学(1):151-159.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ZHOU Sirui WANG Yingchong

Abstract: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pivotal in engaging the extensive populace of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epitomizes a salient cas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Nonetheless, relevant research has been largely neglected. This article draws on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to create a "dual-ring" model, revealing how the interplay between Sinology, publishing, and literary fields collectively influence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Zhao Zhenjiang's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in Spain. It also explores the reciprocal impact between the object (external fields) and the subject (the translator).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elds are not invariably driven by struggles, but new fields often evolve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adjacent fields. When discordance between habitus and fields occurs,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end with a concession on the translator's part. An experienced translator may assume a dominant role and modify the norms by virtue of his or her cultural capital, especially during a new field's inception. This research furnish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dvocat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xpert-guided, collaborative, integra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model for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areer.

Key words: field; habitus;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y

责任编辑:李小青